

第六章 劉楨詩作之評價

歷代論述劉楨的評價時，大多將其與王粲相比，劉王之間孰優孰劣，是歷代評論家看法各異，觀諸家論述，其範疇大抵不脫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與鍾嶸《詩品》二人所論。又劉楨之作品，後代作家多有仿作，可見其確有特出之處，而究竟對於後人產生何種影響，將在本章作一論述。

第一節 劉楨、王粲之次第問題

江淹於〈雜體詩序〉曾云：「公幹仲宣之論，家有曲直」¹，建安七子中，以劉楨、王粲二人成就最高。自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對建安七子做出評論之後，歷代諸評論家對於二人之間的優劣問題各有見解，作為齊梁時代傑出的批評家，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與鍾嶸《詩品》在劉王二人的次第問題上各有不同的論點。他們的觀點對後人產生深遠的影響，此後諸家所論，大抵不脫此二人範疇，茲就二人所論，予以分析探究之。

一、劉勰《文心雕龍》與鍾嶸《詩品》之評價

自曹丕對七子提出評論後，明確提出王粲優於劉楨的說法，當推劉勰。其於《文心雕龍》中，論及劉楨、王粲處有三：

暨建安之初，五言騰踴。文帝陳思，縱轡以騁節；王、徐、應、劉，望

¹（清）陸欽立：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·梁詩卷四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民國73年5月），頁1569。

路而爭驅。²（《明詩》）

建安之末，區宇方輯……仲宣委質於漢南，孔璋歸命於河北，偉長從宦於青土，公幹徇質於海隅，德璉綜其斐然文思，元瑜展其翩翩之樂。³（《時序》）

仲宣溢才，捷而能密，文多兼善，辭少瑕累，摘其詩賦，則七子之冠冕乎！⁴（《才略》）

由上三例可知，劉勰在提及建安七子之時，皆以王粲為首，而《才略》篇更是明言其為七子之冠冕，可見在劉勰心中，王粲的地位是高於劉楨的。但在鍾嶸《詩品》中，王粲與劉楨的位次就有不同的變化：

降及建安，曹公父子，篤好斯文；平原兄弟，郁為文棟；劉楨、王粲，為其羽翼。自有攀龍托鳳，自致於屬車者，蓋將百計。…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，公幹、仲宣為輔。⁵（《詩品·序》）

昔曹劉殆文章之聖。⁶（《詩品·序》）

次有輕薄之徒，笑曹劉為古拙。⁷（《詩品·序》）

然自陳思以下，楨稱獨步。⁸（《詩品·劉楨》）

故孔氏之門如用詩，則公幹升堂，思王入室……⁹（《詩品·陳思王植》）

建安七子中，鍾嶸只將劉楨、王粲二人列為上品，而由上述例子中可以發現，鍾嶸在論及此二人時，皆將劉楨置於王粲之前，並於二、三句將曹劉二人

²（梁）劉勰撰，王更生導讀：《文心雕龍》（臺北：萬象圖書出版社，1997年5月），頁69。

³ 同註2，頁343。

⁴ 同註2，頁366。

⁵（梁）鍾嶸撰，汪中選注：《詩品注》（臺北：正中書局，民國86年2月），頁8。

⁶ 同註5，頁28。

⁷ 同註5，頁18。

⁸ 同註5，頁81。

⁹ 同註5，頁72。

並稱，且稱劉楨為「文章之聖者」，第四句更將劉楨列於曹植之後，顯示出鍾嶸雖提出「一品之中，略以世代為先後，不以優劣為詮次」¹⁰的論人方法，但從《詩品》每每將曹劉並提，可以推知在鍾嶸心中，劉楨的地位實在王粲之前。這與劉勰所論，正好相反。此乃因文學批評家在評斷作品時，多依自身對文學的認知及標準來進行評價，因而形成所論各異之結果，現就其二人說法之差異作一論述。

（一）評論之標的

《文心雕龍》從卷二到卷五，乃其文體論，其所論及之文體多達三十種。而《詩品》為專以五言詩為批評對象的著作，因此在評論的文體上，二人的標準即各自有異。

在詩方面，劉勰對王粲及劉楨的評價，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篇有明確的說法：

若夫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為本；五言流調，則清麗居宗，華實異用，惟才所安。故平子得其雅，叔夜含其潤，茂先凝其清，景陽振其麗，兼善則子建、仲宣，偏美則太沖、公幹。¹¹

建安時代，五言詩已逐漸取代四言詩而成為作詩的主要形式，不過，劉勰仍認為四言是詩的正體風格，而五言乃是流俗之調，故以清新華麗為主。此說與摯虞〈文章流別論〉所云：「五言者……於俳諧倡樂多用之。……然則雅音之韻，四言為正，其餘雖備曲折之體，而非音之正也。」¹²相同，皆以四言為正統的詩學觀念。故云：「兼善則子建、仲宣，偏美則太沖、公幹」，意即是王粲的作品能兼有四言「雅潤」與五言「清麗」的優點。關於王粲的四言詩，現存只有〈贈士孫文始〉、〈贈文叔良〉、〈贈蔡子篤〉、〈贈楊德祖詩〉、〈為潘文則作思親詩〉五首，其中有許多引自《詩經》之語，故陸時雍以「莊而近《雅》」

¹⁰ 同註 5，頁 22。

¹¹ 同註 2，頁 70。

¹² (清)嚴可均輯校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·全晉文》(臺北：宏業書局，民國 64 年 8 月)，卷 77，頁 1905。

¹³評其四言作品，意謂其詩能深得四言「雅潤」之深意，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更有「王粲飛鸞諸制，四言之美，前超後絕」¹⁴之說，可見王粲四言詩之優秀。而曹丕曾言劉楨：「其五言詩之善者，妙絕時人」¹⁵，故知劉楨長於五言詩，因此而謂之「偏美」。職是之故，所以劉勰認為「兼善」四五言的王粲優於只「偏美」五言詩的劉楨。

王粲之「兼善」，不僅表現在詩上，也展現在辭賦上，《文心雕龍·才略》篇云：

仲宣溢才，……摘其詩賦，則七子之冠冕乎！

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曾有「王粲長於辭賦」之說，可見王粲不僅在詩方面有很高的成就，辭賦亦為其所擅長。劉勰曾云：「仲宣靡密，發端必適」¹⁶，並將其與徐幹、左思、潘岳、陸機等人同列為魏晉之賦首。晉朝摯虞〈文章流別論〉亦云：「建安中，魏文帝從武帝出獵，命陳琳、王粲、應瑒、劉楨並作。琳為〈武獵〉、粲為〈羽獵〉、瑒為〈西狩〉、楨為〈大閱〉。凡此各有所長，粲其最也。」¹⁷可見在眾人同題唱和的賦作中，以王粲的表現最佳。王粲之賦作今可見者有二十餘篇，其中以〈登樓賦〉為其代表作，敘述作者登樓懷鄉之感，情景交融，透過今昔並述而刻劃出作者思鄉之愁情，為歷來所稱之佳作。陸雲〈與兄平原書〉曾云：「〈登樓〉名高，恐未可越爾」¹⁸，朱熹亦云：「〈登樓賦〉者，魏侍中王粲之所作也。歸閒子曰：『粲詩有古風。〈登樓〉之作，去《楚辭》遠，又不及漢，然猶過曹植、潘岳、陸機〈愁詠〉、〈閒居〉、〈懷舊〉眾作，蓋魏之賦極此矣。』」¹⁹此二人所論，肯定了王粲在辭賦上的高度成就，也說明了劉勰以其為「魏賦之首」、「七子冠冕」之評價。

¹³（明）陸時雍：《詩鏡總論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5年6月）收錄於《全明詩話》冊6，頁5109。

¹⁴（梁）蕭子顯撰：《南齊書·文學傳論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年8月），卷52，頁908。

¹⁵（清）嚴可均輯校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·全三國文》，卷7，頁1089。

¹⁶（梁）劉勰撰，王更生導讀：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，頁92。

¹⁷穆克宏、郭丹編：《魏晉南北朝文論全編》（江蘇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12月），頁91。

¹⁸見於《陸士龍文集·卷八》（收於（清）永瑢、紀昀等纂修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民國75年3月），冊1063，頁447。

¹⁹朱熹：《楚辭後語·卷四》（收於楊家駱主編：《楚辭注八種》，臺北：世界書局，民國70年12月），頁22。

相較於王粲，《文心雕龍》並未對劉楨的賦作明確的評價，但由劉勰認為王粲乃「七子之冠冕」一語觀之，王粲的「兼善」，不僅展現於詩上，在賦的表現更是特出，故與只偏美於「五言詩」的劉楨相比，王粲的總體評價仍在劉楨之上，這是劉勰就詩賦層面所下的定論。

劉勰所論，遍及王粲各類文體，王粲之兼善，展現在對詩賦文論的創作上，因此劉勰是全面性的從王粲的各類作品來評述王粲與劉楨之優劣。而《詩品》則專以五言詩為評述對象，其對五言詩的定義如下：

夫四言，文約意廣，取效《風》、《騷》，便可多得，每苦文繁而意少，故世罕習焉。五言居文辭之要，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，故云會於流俗，豈不指事造形，窮情寫物，最為詳切者耶……²⁰

與劉勰不同，鍾嶸提出四言之缺在「每苦文繁而意少」，而五言詩因具「指事造形，窮情寫物，最為詳切」之特色，所以較四言詩更具滋味，故為「詩之至也」。因此全書專以五言詩為批評對象，這就與認為「四言正體，則雅潤為本；五言流調，則清麗居宗」的劉勰有所差異。又曹丕曾有劉楨「其五言詩之善者，妙絕時人」之說，可見劉楨確以五言詩著稱於當時。無怪乎以五言為主的鍾嶸會有：「自陳思以下，楨稱獨步」之論，將其列於王粲之前。

綜上所述，由於劉勰與鍾嶸在文體批評的標準上並不相同，劉勰述及各種文體，而鍾嶸則專論五言；又二人對五言詩的定義不同，劉勰認為五言乃流俗之調，而鍾嶸則以五言詩為「眾作之有滋味者」，因此在劉楨、王粲的評價上自會各有殊異。

（二）風力與文采

劉勰與鍾嶸不但文體評論的標準各異，在對於文章的審美思維上，也各有所偏重，而這亦影響二人對劉楨與王粲的評價，茲就二人之審美理論論述分析之。

²⁰ 同註 5，頁 15。

在審美理論方面，劉勰主張風骨與文采並重，其在《文心雕龍·風骨》篇曾言：「若豐藻克瞻，風骨不飛，則振采失鮮，負聲無力」，「若風骨乏采，則鷲集翰林；采乏風骨，則雉竄文囿，唯藻耀而高翔，固文章之鳴風」²¹可見劉勰在力倡剛健爽朗文風的同時，也追求語言上的華麗辭采，是以其有所謂〈情采〉、〈聲律〉、〈麗辭〉、〈比興〉、〈誇飾〉、〈事類〉等篇章。劉勰此種兼重風骨與文采的觀念，正展現在對王粲和劉楨的評論上。如其評王粲：

暨建安之初，五言騰踴，……王、徐、應、劉……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。²²（《文心雕龍·明詩》）

仲宣……發端必道。（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）

仲宣捷而能密²³（《文心雕龍·才略》）

仲宣靡密（《文心雕龍·詮賦》）

由前二句觀之，劉勰認為王粲作品富有遒勁、慷慨的風骨，而後二句則指出其作品具有靡麗細密的文采，故能兼重風骨與文采。而在論及劉楨時，劉勰云：

公幹氣褊，故言壯而情駭。²⁴

由上所述可知，劉楨之作因氣褊之故，故言辭豪壯而有思慮不周之處，同時代的曹丕曾言其「壯而不密」，而鍾嶸亦認為劉楨：「氣過其文，雕潤恨少」²⁵雖有氣，但文采不足，並不符合劉勰所謂「風骨與文采並重」的審美理論，因此將劉楨列於王粲之下。

作為同時代的文學批評專家，鍾嶸也與劉勰一樣，強調文質並重的觀念，在其《詩品序》中，則提出「幹之以風力，潤之以丹采」²⁶的說法，「風力」

²¹ 同註 2。

²² 同註 2。

²³（梁）劉勰撰，王更生導讀：《文心雕龍·才略》，頁 366。

²⁴（梁）劉勰撰，王更生導讀：《文心雕龍·體性》頁 254。

²⁵ 同註 5，頁 81。

²⁶ 同註 5，頁 16。

即風骨，「丹采」即為文采。在《詩品》中，將此二者做了最完美結合之人，當推曹植，由鍾嶸評其「骨氣奇高，辭采華茂」²⁷一語即可看出鍾嶸與劉勰都以兼重風骨與文采為評論文章的依據。其評王粲：「文秀而質羸」²⁸認為其文辭華美，而劉楨「雕潤恨少，氣過其文」以風骨見長，二人都各有不足之處。那麼，何以劉楨優於王粲？這是因為南朝齊梁文風傾向綺靡柔美，因此風骨不存，鍾嶸曾於評論張華時云：「其體華艷，興托不寄……猶恨其兒女情長，風雲氣少」²⁹從這段話中可以得知，鍾嶸認為張華詩雖辭藻華麗，重視文采的鋪排，但缺少深刻的含意及寄託，故沒有英雄豪邁的氣概。鍾嶸此論，明白指出在風力和丹采之間，「風力」的重要性是先於「丹采」的，職是之故，雖然劉楨「雕潤恨少」，但因其「真骨凌霜，高風跨俗」，以風骨見長，其風力仍凌駕於「文秀而質羸」的王粲之上，是故認為劉楨優於王粲。

（三）重氣與重情

自曹丕提出「文以氣為主」的論點後，以「氣」論文便成了論述作品的一個重要依據。這樣的觀念也影響了劉勰，因此於《文心雕龍·風骨》曾言「是以綴慮裁篇，務盈守氣，剛健既實，輝光乃新，其為文用，譬征鳥之使翼也」³⁰，認為文氣如征鳥之使翼一般，是支撐創作的最佳利器。除重「氣」之外，劉楨似乎更重「情」。他曾於《文心雕龍·體性》提出：「夫情動而言形」³¹，《情采》：「情者文之經」、「為情而造文」；《附會》：「必以情志為神明」³²；《物色》：「情以物遷，辭以情發」，可見為文有「情」是劉勰評論的一個重要概念，而劉勰認為理想的創作應做到「情與氣偕」。王粲之文雖不如劉楨有氣，但有「慷慨以任氣」的部份，而且充滿豐富的情感，歷代評論家給予這樣的描述：

發悽愴之辭，文秀而質羸。（《詩品·王粲》）

²⁷ 同註 5，頁 72。

²⁸ 同註 5，頁 84。

²⁹ 同註 5，頁 138。

³⁰ （梁）劉勰撰，王更生導讀：《文心雕龍·風骨》，頁 256。

³¹ （梁）劉勰撰，王更生導讀：《文心雕龍·體性》，頁 253。

³² （梁）劉勰撰，王更生導讀：《文心雕龍·附會》，頁 333。

跌宕不足而真摯有餘，傷亂之情，小雅變風之餘也。³³（《采菽堂古詩選》卷七）

王仲宣、潘安仁詩悲而不壯。³⁴（《藝概·詩概》）

遭亂流離，自傷情多。³⁵（《擬魏太子鄴中詩序》）

諸家所論，皆認為王粲作品雖無壯烈氣勢，但卻真實的描述了「遭亂流離」的現實給予詩人「鬱悶傷悲」的情緒。如〈七哀詩〉中，「出門無所見，白骨蔽平原」一句，即描述出「西京亂無象」的現實景況，而「喟然傷心肝」則寫出回首望長安時所產生的悲愴之情。其《登樓賦》則抒發報國無門、不得重用，又思鄉情濃所呈現的悲涼愁緒。的確符合《文心雕龍·情采》所謂「為情而造文」、「要約而寫真」之論，故劉勰給予很高評價。

相較於劉勰以「重情」評論王粲，鍾嶸則「以極大的激情去讚揚剛美³⁶」而「剛美是氣充於中而有的文風³⁷」故以「氣」作為品評文人的重要標準。其云：「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，故搖蕩性情，形諸舞詠」說明氣為文章產生的重要原因，因此是論詩的重要準則。由其評曹植「骨氣其高」；評劉楨「仗氣愛奇」；論劉琨「清拔之氣」；論晉宋五子「氣調勁拔」之語可看出，「重氣」為鍾嶸品評之重要標準。而劉楨之作，歷來諸家給予的評述如下：

公幹有逸氣。³⁸（曹丕〈與吳質書〉）

文最有氣，所得頗經奇。³⁹（謝靈運〈擬魏太子鄴中詩序〉）

仗氣愛奇。（《詩品·劉楨》）

³³（清）陳祚明：《采菽堂古詩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刻本，2002年3月），冊1590，頁695。

³⁴（清）劉熙載撰：《藝概·詩概》（臺北：金楓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頁84。

³⁵顧紹柏校注：《謝靈運集校注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民國93年4月），頁206。

³⁶張懷瑾：《鍾嶸詩品評注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30。

³⁷周薇：〈王粲位次與魏晉南北朝文論的審美自覺〉（貴州社會科學，2002年3月），第2期。

³⁸（清）嚴可均輯校：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·全三國文》，卷7，頁1089。

³⁹同註35，頁219。

公幹氣褊，故言壯而情駭。（《文心雕龍·體性》）

辭氣鋒烈，莫有折者。⁴⁰（《太平御覽》卷三八五注引《文士傳》）

由諸家所論，可知劉楨之作的確展現出「氣勝」的文風，由〈贈從弟〉其二藉「風聲一何盛。松枝一何勁。冰霜正慘淒。終歲常端正」來歌詠高松不畏霜寒而兀自端正的形象，可說明其詩風骨遒勁的特色。又如其〈鬥雞詩〉描述鬥雞之形貌及鬥爭場面，亦呈現出氣勢勁健的特色，這與善於作「悽愴之辭」的王粲文風，是迥然相異的。因此「重氣」的鍾嶸，自然將劉楨列於王粲之上。

劉勰《文心雕龍》和鍾嶸《詩品》對劉楨與王粲的評價是歷來最常被引述的論點，而其所論之不同原因有三點：一是兩人對於文體的評論標準不一致：劉勰是全面性的就各種文體作討論，而鍾嶸則專就五言詩為評述對象，是以評述各異。二是兩人對於風骨與文采的論點有異，劉勰以兼重風骨與文采作為評價依據，而鍾嶸則偏重「風骨」的角度論斷詩人，是故產生差別；三是兩人對於文之「氣」與「情」各有偏重，劉勰重「情」，鍾嶸重「氣」，因此立論不同。批評家各以不同的角度對詩人進行評價，自然結果各異。

二、後人評述

建安詩人中，曹植是公認成就最高者。而建安七子中，又以劉楨、王粲成就較高。歷代評論家在論及此二人時，往往有「曹劉」並稱或「曹王」並稱的情形，茲略舉數例如下：

（一）同於《文心雕龍》所論者

贊同劉勰之論者，多以曹王並稱，將曹植、王粲視為建安詩壇的代表。如：

自漢至魏，四百餘年，辭人才子，文體三變，……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，

⁴⁰（宋）李昉等撰：《太平御覽記》（臺北：大化書局，民國66年5月），頁1780。

並標能擅美，獨映當時。⁴¹（沈約《宋書·謝靈運傳論》）

近世有樂安任昉，海內髦傑，早綰銀黃，夙昭民譽。道文麗藻，方駕曹王……⁴²（劉峻〈廣絕交論〉）

魏陳思下，仲宣散章，間有釋語。⁴³（胡應麟《詩藪·內編》卷一）

仲宣之詩過於公幹，以贈從軍及贈五官中郎將及公讌詩比之可見。⁴⁴（姚範《援鶉堂筆記》卷四十四）

子建、仲宣則才思逸發，華藻爛然。⁴⁵（許學夷《詩源辯體》卷四）

公幹氣緊，不如仲宣。⁴⁶（方東樹《昭昧詹言》卷二）

陳思天姿既高……同時惟仲宣，局面闊大，語言清警，差足相敵。⁴⁷（同上）

仲宣詩清而麗，在建安中子建而下應宜首推。⁴⁸（吳淇《六朝選詩定論》卷六）

由上述可知，歷代評論家將曹王並稱之因，大多與劉勰認為王粲「兼善四五言」、「風骨文采並重」、「為文重情」的特色相符。如沈約言「並標能擅美，獨映當時」則是就王粲作品情采並重的觀點來作論述。劉峻所言：「適文麗藻，方駕曹王」，則以文采的角度評斷，而姚範更直言「仲宣之詩過於公幹」認為粲詩優於劉楨，此與劉勰所言「兼善則子建、仲宣，偏美則太沖、公幹」

⁴¹（梁）沈約撰：《宋書·謝靈運傳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民國64年6月），卷67，頁1778。

⁴²（梁）劉峻撰，羅國威校注：《劉孝標集校注》（臺北：貫雅文化出版社，民國80年2月），頁114。

⁴³（明）胡應麟撰：《詩藪》（收於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影印明刻本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3月），冊1696，頁62。

⁴⁴（清）姚範撰：《援鶉堂筆記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60年8月），頁1674。

⁴⁵（明）許學夷《詩源辯體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5年6月）收錄於《全明詩話》冊4，頁3124。

⁴⁶（清）方東樹撰：《昭昧詹言》（臺北：漢京文化事業，民國74年9月），頁78。

⁴⁷同註46，頁70。

⁴⁸郁賢皓、張采民箋註：《建安七子詩箋註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0年5月），頁135。

之論相符。方東樹「公幹氣緊，不如仲宣」之論，正符合劉勰「公幹氣褊，故言壯而情駭」的說法，認為劉楨詩並不如王粲局面開闊，語言清警。而吳淇則以「清麗」評王粲詩作，正同於劉勰所謂：「茂先得其清，景陽振其麗，兼善則子建仲宣」的論點，因此將王粲視為建安七子之代表。

（二）同於《詩品》所論者

贊同鍾嶸之論者，多以曹劉並稱，將曹植、劉楨視為建安詩壇的代表。如：

自屈宋以降，為文者本於哀艷，務於恢誕，亡於比興，失古義矣。雖揚馬形似，曹劉骨氣，潘陸麗藻，文多用寡，則是一技，君子不為也。⁴⁹（柳冕〈與徐給事論文書〉）

鄴中七子，陳王最高，劉楨辭氣偏，王得其中，不拘對屬，偶或有之，語與興驅，勢逐情起，不由作意，氣格自高。⁵⁰（皎然《詩式·鄴中集》）

杜甫：方駕曹劉不啻過。⁵¹（杜甫〈奉寄高常侍詩〉）

曹劉坐嘯虎生風，四海無人角兩雄。⁵²（元好問《論詩三十首》其二）

鄴下曹劉氣盡豪。⁵³（元遺山《元遺山詩箋注》卷十三）

漢魏之有曹植，劉楨，皆氣高出於天縱。⁵⁴（遍照金剛《文鏡秘府論·南卷·論文意》）

⁴⁹ 周祖謨撰：《隋唐五代文論選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0年5月），頁166。

⁵⁰ 許清雲撰：《皎然詩式輯校新編》（臺北：文史哲出版社，民國73年3月），頁19。

⁵¹ 杜甫：《杜工部集》（臺北：學生書局，民國60年2月景印2版），頁552。

⁵² 方滿錦撰：《元好問〈論詩三十首〉研究》（臺北：萬卷樓出版社，民國91年9月），頁161。

⁵³（金）元好問撰，（清）施國祁箋注：《元遺山詩集箋注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62年6月），卷13，頁664。

⁵⁴（日）遍照金剛撰：《文鏡秘府論·南卷·論文意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社，民國63年1月），頁112。

至如曹劉，詩多直語。⁵⁵（殷璠《河岳英靈集》）

鍾嶸《詩品》評曹植為「骨氣奇高」，而對劉楨的評價為：「仗氣愛奇，動多振絕。真骨凌霜，高風跨俗」。由鍾嶸所言，確能看出二人之所以並稱乃因其「重氣」之故，從上述的內容看來，諸家所論，正符合鍾嶸的說法。如柳冕言「曹劉骨氣」，即是由氣勝的角度將二人合稱；皎然《詩式》則認為劉楨「不由作意，氣格自高」，顯示出劉楨不為文造情，以氣骨取勝的特點，故將其列為曹植之後第一人；而元好問則以「曹劉坐嘯虎生風」評述二人風骨奇高，故無人可與之相較；遍照金剛則明指曹劉二人具有「氣格高逸」的特點；殷璠則言曹劉二人「詩多直語」，作品往往透過景物、事物的描寫中抒發詩人真摯的感情，因此情感真實自然，是因情而為文，這與前述皎然《詩式》所謂「語與興驅，勢逐情起」之說是相通的。而《詩品》在述及劉楨「氣勝」的優點時，也提出了「氣過其文，雕潤恨少」的缺點，胡應麟《詩藪·內編》卷二亦有「公幹才偏氣過詞」的說法，可見鍾嶸所論，多為後世評論者所認同。

綜上所述，關於劉楨王粲二人的次第高下，贊同劉勰之說者，是就王粲之文采與情思高於劉楨來論述，並將其與曹植並稱，持此觀點者有沈約、劉峻、胡應麟、姚範等人。而贊同鍾嶸所論者，則根據劉楨氣骨勝於王粲的觀點，因此將之與曹植並稱，歷代評論家中，柳冕、皎然、元好問及遍照金剛等人多持此論。二派論點各有不同，對此，許學夷《詩源辨體》有很好的說明：「公幹、仲宣一時未易優劣，鍾嶸以公幹為勝，劉勰以仲宣為優。予嘗為二家品評：『公幹氣勝於才，仲宣才優於氣』」⁵⁶，劉熙載亦云：「公幹氣勝，仲宣情勝，皆有陳思之一體，後世詩率不越此兩宗。」⁵⁷

評論家在品評文章時，會依照自身對文學的認識及其獨特的審美標準來評論，劉勰與鍾嶸二人，在選文的標準及審美的價值上，本就各自偏重，因而造成他們對劉王的評論各異，劉勰認為王粲「情長」，鍾嶸稱許劉楨「氣勝」，這都是因為批評的標準不一致之故，因此難有定論。對此，筆者以為，從藝術的角度而言，作家的高下，本就難以用特定的數量作為衡量的標準，故雖無法

⁵⁵（唐）殷璠撰，王克讓集注：《河岳英靈集注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6年7月），頁1。

⁵⁶ 同註45，頁3125。

⁵⁷ 同註34，頁82。

對劉楨與王粲之間，是才情勝於氣骨，或是氣骨高於才情作出一個允當的評斷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們都各自在詩歌領域上展現了極高的藝術價值。

第二節 劉楨詩作對後世的影響

劉楨之作名高於建安，鍾嶸《詩品》有「自陳思以下，楨稱獨步」之說，又云：「昔曹劉殆文章之聖」，將曹劉並稱，宋人嚴羽亦贊同此說法，其於《滄浪詩話·詩體》篇曾謂：「以人而論，則有蘇李體、曹劉體」⁵⁸，指出他與曹植俱聞名於建安，因而合稱「曹劉體」，可見劉楨的詩風，在當時確實備受眾人矚目，以致於六朝文人多擬其作，今可見者有謝靈運、劉孝綽、鮑照、江淹四人。除擬作其詩外，亦有承襲其文風者，如《詩品》謂其「源出公幹」的左思。透過此五人的作品，我們可以看出各家筆下所呈現的劉楨風貌，有助於更為全面的了解劉楨詩作的特色，現就擬作其詩的四人及承其文風的左思為例論述之，以明劉楨作品對後世的影響。

一、左思：其源出於公幹者

左思，字太冲，齊國臨淄（今山東淄博）人。其詩作以〈詠史詩〉八首為代表作，辭情兼備，是太康時期最傑出的作家。鍾嶸《詩品》將其列為上品，並謂：「其源出公幹，文典以怨，頗為精切，得諷諭之致。」⁵⁹，又鍾嶸謂劉楨：「仗氣愛奇，動多振絕，真骨凌霜，高風跨俗」，故從「源出公幹」一句可知，左思的詩風，繼承了劉楨「氣勝」的特色，而此氣指的是建安文學「剛健有力」的積極精神，這是建安風骨最為顯著的藝術特徵，左思的〈詠史詩〉八首，正展現出建安風骨剛健的特色，現就二人作品作一論述，以明其文風相承之關係。

⁵⁸（宋）嚴羽撰，郭紹虞校注：《滄浪詩話校釋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民國76年4月），頁58。

⁵⁹ 同註5，頁108。

(一) 氣勢勁健

左思藉〈詠史詩〉八首⁶⁰來寫自己的抱負和心中不平之情，全詩可分為三部份，分別代表詩人生命前中後三期不同處境及心情的寫照，在前期的作品中，左思展現出強烈的自信心與積極的用世態度，情調是高昂的：

弱冠弄柔翰，卓犖觀群書。著論準過秦，作賦擬子虛。邊城苦鳴鏑，羽檄飛京都。雖非甲冑士，疇昔覽穰苴。長嘯激清風，志若無東吳。鉛刀貴一割，夢想騁良圖。左眄澄江湘，右盼定羌胡。功成不受爵，長揖歸田廬。（〈詠史詩〉八首之一）

吾希段幹木，偃息藩魏君。吾慕魯仲連，談笑卻秦軍。當世貴不羈，遭難能解紛。功成恥受賞，高節卓不群。臨組不肯繼，對珪寧肯分。連璽曜前庭，比之猶浮雲。（〈詠史詩〉八首之三）

濟濟京城內，赫赫王侯居。冠蓋蔭四術，朱輪竟長衢。朝集金張館，暮宿許史廬。南鄰擊鐘磬，北裏吹笙竽。寂寂楊子宅，門無卿相輿。寥寥空宇中，所講在玄虛。言論準宣尼，辭賦擬相如。悠悠百世後，英名擅八區。（〈詠史詩〉八首之四）

在此三首詩中，詩人展現了強烈的自許心情，在文章方面則自比為「賈誼」、「司馬相如」；在政治軍事方面則以「穰苴」、「段幹木」、「魯仲連」等人自比；希望自己能夠展現「左眄澄江湘，右盼定羌胡」、「偃息藩魏君」、「談笑卻秦軍」的建功心願，詩人於此展現出一股豪邁俊逸的氣勢，這與劉楨〈遂志賦〉所言：「梢吳夷於東隅，掣畔臣乎南荆。戢干戈於內庫，我馬繫而不行。揚洪恩於無涯，聽頌聲之洋洋。四寓尊以無為，玄道穆以普將。翼俊乂於上列，退仄陋於下場。」所呈現的積極奮發心態是相同的，二人都呈現了一股希冀建功立業，報效國家的心志，使得詩作予人豪氣干雲之感。又左思在功業完成後以「功成不受爵，長揖歸田廬」、「功成恥受賞，高節卓不群」二句表現出功成身退的情志，這種坦蕩不受爵、恥受賞的胸懷，與劉楨〈遂志賦〉所言：「襲

⁶⁰（清）陸欽立：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·晉詩卷七》，頁 732-734。

初服之蕪蕨，託蓬蘆以遊翔」之情懷相同。顯現二人皆有不同於流俗的胸襟與傲骨，故能於作品中展現雄渾豪邁的氣勢。而中期的詩作，則描繪出功業未成，理想受挫下的矛盾心情：

皓天舒白日，靈景耀神州。列宅紫宮裏，飛宇若雲浮。峨峨高門內，靄靄皆王侯。自非攀龍客，何為歛來遊。被褐出閭闔，高步追許由。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。（〈詠史詩〉八首之五）

荆軻飲燕市，酒酣氣益震。哀歌和漸離，謂若傍無人。雖無壯士節，與世亦殊倫。高眇邈四海，豪右何足陳。貴者雖自貴，視之若埃塵。賤者雖自賤，重之若千鈞。（〈詠史詩〉八首之六）

主父宦不達，骨肉還相薄。買臣困樵采，伉儷不安宅。陳平無產業，歸來醫負郭。長卿還成都，壁立何寥闊。四賢豈不偉，遺烈光偏籍。當其未遇時，憂在填溝壑。英雄有迺遭，由來自古昔。何世無奇才，遺之在草澤。（〈詠史詩〉八首之七）

此期詩作，不同於前期那種昂揚積極的心態，故其所引之人變為「宦不達」的主父偃、「困樵采」的朱買臣、「負郭窮巷」的陳平、「家徒四壁」的司馬相如及荆軻、高漸離等人，反映出作者已能深深體會「英雄有迺遭，由來自古昔」的現實，作品情調變為梗慨多氣，但作者並未因此自卑，反而透過批評當世權貴者來顯示自身的高潔，如：「高眇邈四海，豪右何足陳。貴者雖自貴，視之若埃塵」一句則顯示出對權貴者的輕鄙態度。並以「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」展現自身卓犖不群的性格。雖不得重用，然而還是以「何世無奇才，遺之在草澤」之句充分肯定自身之價值。這與劉楨遭遇頗似，原以蘋藻、高松、鳳凰為喻的劉楨，在歸曹後並未獲得重用，而只是作一職事小吏，相較於〈遂志賦〉那種極欲建功立業的心情，劉楨〈雜詩〉則呈現出有志難伸的鬱悶情感。二人在情感上，都有相似之處，因此於作品中顯露梗慨多氣的情調。而左思晚期的作品，流露出對仕途不抱希望的心情：

鬱鬱澗底松，離離山上苗。以彼徑寸莖，蔭此百尺條。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沈下僚。地勢使之然，由來非一朝。金張藉舊業，七葉珥漢貂。馮公豈不偉，白首不見招。（〈詠史詩〉八首之二）

習習籠中鳥，舉翮觸四隅。落落窮巷士，抱影守空廬。出門無通路，枳棘塞中塗。計策棄不收，塊若枯池魚。外望無寸祿，內顧無門儲。親戚還相蔑，朋友日夜疏。蘇秦北遊說，李斯西上書。俛仰生榮華，咄嗟復彫枯。飲河期滿腹，貴足不願餘。巢林棲一枝，可為達士模。（〈詠史詩〉八首之八）

由以上二詩可以看出，左思對於政治仕途，從原先充滿期待，轉為絕望。詩以馮唐自比，以「白首不見招」寫己因身分卑下故未受重用之境況。而後又以「習習籠中鳥」比喻自身進退失據，親友疏離之情景。再以「俛仰生榮華，咄嗟復彫枯」寫其一生歷盡滄桑之心情，詩末則用「巢林棲一枝，可為達士模」這種超脫的心境來安慰自己，筆調是悲涼且慷慨低沉的。這樣的心態，在劉楨的作品中亦有呈現，如其〈雜詩〉、〈贈徐幹詩〉皆表達了己身鬱鬱不得志的情感，也許正因左、劉二人境遇相似，因而作品中皆流露「悲涼梗概」的筆調，體現了「建安風骨」的精神，是以鍾嶸言其「源出於公幹」。

（二）善用比興

左思不但在詩風上承襲劉楨「氣健」的特色，在寫作手法上，也與劉楨同樣使用比興的手法來詠物。如：〈詠史詩〉八首之二：

鬱鬱澗底松，離離山上苗。以彼徑寸莖，蔭此百尺條。世胄躡高位，英俊沈下僚。地勢使之然，由來非一朝。

本詩在抒發對西晉門閥制度的批判，表達因身分高下而造成政治際遇的不均等，以致於庸才得列上位而賢者卻懷才不遇的景況，表示強烈的不滿。詩人以「澗底松」比喻沉下僚的賢士；以「山上苗」比喻躡高位的世胄。而「徑寸莖」是形容世胄之才庸、「百尺條」則言賢士之才高，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不在本身才德的高下，而是先天「地勢使之然」的結果，顯見其對於封建制度的不滿。又〈詠史詩〉八首之八云：

習習籠中鳥，舉翮觸四隅。落落窮巷士，抱影守空廬。

此用「籠中鳥」來比喻「窮巷士」，鳥因為籠所侷，故舉措受限，無法展

其翹翼。此情形正如「窮巷士」一般，欲遂其抱負，然受限於身分之故，因而有志難伸，最後只得抱憾終身。「百尺條的澗底松」及「籠中鳥」、「窮巷士」皆是詩人形象的自喻。所謂「文典以怨」是指借用歷史人物的事蹟，來抒發詩人心中的感懷。而「頗為精切」則是指善於取譬來作貼切的比喻。在劉楨詩中，比興手法的使用如〈贈從弟詩〉三首：藉蘋藻、高松、鳳凰來比喻詩人自身高潔形象，而〈失題詩〉中的素木、野青雀、女羅草、風中燭亦是詩人形象的寫照。左思與劉楨善於使用貼切的比喻，因此使作品更具感染力，興味更加濃厚。

此外，左思還善於運用對比的寫作手法，如〈詠史詩〉八首之二：「澗底松」與「山上苗」是地勢的對比；「徑寸莖」與「百尺條」是才德的對比；「躡高位」的「世胄」與「沉下僚」的「英俊」賢士，是地位的對比；「金、張家族」與「馮唐」則為際遇的對比，由此可明顯感受到二者之間懸殊的差異，自然增強了作品的說服力。又如：

濟濟京城內，赫赫王侯居。冠蓋蔭四術，朱輪竟長衢。朝集金張館，暮宿許史廬。南鄰擊鐘磬，北裏吹笙竽。寂寂楊子宅，門無卿相輿。寥寥空宇中，所講在玄虛。言論準宣尼，辭賦擬相如。悠悠百世後，英名擅八區。（〈詠史詩〉八首之四）

此詩可分作兩部份，前八句描述京城王侯歌舞生平的熱鬧景象；後八句則描寫寒士冷落寂寞、潛心著述的生活情況。詩人刻意呈現貴族與賢士的日常生活，目的在藉二者的對比，突顯寒士高潔不群的情操。而劉楨作品中的對比運用，則展現在〈贈從弟詩〉中：如「深澤蘋藻」與「園中葵」；「鳳凰」與「黃雀」二則，與左思的對比意象相似，皆是透過賢與愚、尊與卑二者的對比，造成尊者更尊，卑者愈卑的意象。而〈雜詩〉則藉閒適的鳧雁與困於簿書的詩人兩相對比，表達出自身的苦悶心情與對於自由生活的嚮往之情。

左思〈詠史詩〉是其一生心境的寫照，詩中表現了左思鮮明的個性及高遠的胸懷。前期作品展現出積極用世的自信心態，故氣勢雄健，情緒激昂，中期歷經轉折，情調漸趨梗慨多氣，晚期因終未遂其志願，故筆調轉為深沉悲涼。他的經歷與心境與劉楨頗為相似，每每於作品中呈現慷慨悲涼之氣，正是對建安風骨的承繼與發揚，是故《詩品》給予「源出於公幹」的評論。

二、謝靈運：〈擬魏太子鄴中集詩·劉楨〉

謝靈運是首先仿擬劉楨詩歌之人，他在〈擬劉楨詩〉一首之序文對劉楨作了這樣的評價：「卓犖偏人，而文最有氣，所得頗經奇」，所謂「卓犖」指的是其性格，而「偏人」就黃節的解釋，是「謂其有偏能也」⁶¹，因此非兼擅各體的文才，故「卓犖偏人」是就其性格與文才而言。而由「文最有氣，所得頗經奇」一語可知謝靈運認為劉楨的文章風格乃是「有氣」與「經奇」二者，而鍾嶸亦評之以「仗氣愛奇」，與謝靈運之說相同。都認為詩風勁健乃劉楨詩之特色，其〈擬魏太子鄴中集詩·劉楨〉詩云：

貧居晏裏閑，少小長東平。河兗當沖要，淪飄薄許京。廣川無逆流，招納廁羣英。北渡黎陽津，南登紀郢城。既覽古今事，頗識治亂情。歡友相解達，敷奏究平生。矧荷明哲顧，知深覺命輕。朝遊牛羊下，暮坐括揭鳴。終歲非一日，傳卮弄新聲。辰事既難諧，歡願如今並。唯羨肅肅翰，繽紛戾高冥。⁶²

全詩乃是以自述的口吻，假設自身為劉楨，用詩人口吻寫出當時的感受。首四句乃寫流浪許京之因，而「廣川無逆流，招納廁羣英。北渡黎陽津，南登紀郢城」則寫歸附曹操，並隨其征戰之事；「既覽古今事，頗識治亂情」則言明己之才學；「歡友相解達，敷奏究平生。矧荷明哲顧，知深覺命輕」表達自身能獲同道，又為明主所用，故力圖效命之志；「朝遊牛羊下，暮坐括揭鳴。終歲非一日，傳卮弄新聲」則寫公讌侍遊的生活情形；「辰事既難諧，歡願如今並。唯羨肅肅翰，繽紛戾高冥」說明了自己雖隨侍在君王之側，但並未受到重用，故生志未能酬之感。相較於劉楨〈贈從弟〉三首以蘋藻、松柏、鳳凰為喻而產生的奇境與氣勢，謝靈運只在詩序中提及劉楨詩風，但在此作並未展現劉楨詩之特色，只是就其生平作一論述，故雖言擬作，實則「擬劉楨口吻」來敘述平生遭遇，而非就「擬其詩風」的層面創作。

⁶¹ 黃節撰：《謝康樂詩注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民國 94 年 10 月），頁 173。

⁶² 同註 39。

三、劉孝綽：〈侍宴擬劉公幹應令詩〉

劉孝綽所擬劉楨之詩，名為〈侍宴擬劉公幹應令詩〉⁶³，由詩名看來，其所仿擬的內容，是以劉楨的〈公讌詩〉與〈贈五官中郎將詩〉其四為主，內容多為參與公宴侍遊之情景。劉楨的〈贈五官中郎將詩〉其四：

涼風吹沙礫，霜氣何皚皚。明月照綵幕，華燈散炎輝。賦詩連篇章，極夜不知歸。君侯多壯思，文雅縱橫飛。小臣信頑鹵，僂俛安能追。

起首四句以軍營帳外冷冽寒風、濃重霜氣來襯托室內燈火輝映。而後則寫君臣賦詩的熱鬧氣氛。最後四句說明曹丕才思敏捷、構思宏大，文采奔放飛揚，而劉楨自覺文采魯鈍，即使勤奮努力仍無法與之相及，表現出對曹丕才華出眾的無限欽佩之情。詩的前四句藉「涼風」、「霜氣」、「明月」、「華燈」寫出季節和時間，呈現一股清健勁逸之勢，故雖寫侍宴場面，仍舊可感受到劉楨「重氣」的特色，而觀劉孝綽之詩：

副君西園宴，陳王謁帝歸。列位華池側，文雅縱橫飛。小臣輕蟬翼，黽勉謬相追。置酒陪朝日，淹留望夕霏。

首句寫曹丕設宴之地，次句寫曹植赴宴。三四句寫諸文士與宴賦詩之景況，其中「文雅縱橫飛」明顯是借用劉楨「文雅縱橫飛」之句。末兩句則借用劉楨「小臣信頑鹵，僂俛安能追」之句，劉楨言「性頑鹵」已有自謙之意，而劉孝綽則以「輕蟬翼」代之，又將劉楨「安能追」代之以「謬相追」，這讓前述的「輕蟬翼」顯得更加微不足道，使得全詩氣勢更為疲弱。最後二句描述赴宴情意的意猶未盡，這與劉楨〈公宴詩〉：「永日行遊戲，歡樂猶未央。遺思在玄夜，相與復翱翔」的意念相同。若將二詩相比，劉楨的詩中，可明顯感受到君臣相得的歡樂之情；然在劉孝綽詩中，「小臣輕蟬翼，黽勉謬相追」未能承接「文雅縱橫飛」之高昂氣勢，反使全詩欲振無力，不如劉楨氣勢縱橫。

⁶³（清）陸欽立：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·梁詩卷十六》，頁1839-1840。

四、鮑照：〈學劉公幹體五首〉

鮑照乃是四人當中，摹擬劉楨詩作最多者，有〈學劉公幹體五首〉⁶⁴，其一：

欲宦乏王事，結主遠恩私。為身不為名，散書徒滿帷。連冰上冬月，披雪搭園葵。聖靈燭區外，小臣良見遺。

本詩描寫未能得君重用之幽情，詩句中多有效仿劉楨之詩句處，如「散書徒滿帷」化用劉楨〈雜詩〉：「職事相填委，文墨消紛散」之句；「披雪搭園葵」則借用劉楨〈贈從弟詩〉其一：「豈無園中葵，懿此出深澤」之句；而「聖靈燭區外，小臣良見遺」則出自劉楨〈贈徐幹〉二首之一：「仰視白日光，皦皦高且懸。兼燭八紘內，物類無頗偏。我獨抱深感，不得與比焉。」寫獨不受君王重用的愁思。事實上，鮑照因出身寒微，故屢不受重用，這種鬱鬱不得志之心情，在這首擬作中，得到了很好的展現。本詩是就情感的層面進行擬作，是擬其情，而非就氣骨層面仿作。又第二首云：

壹壹寒野霧，蒼蒼陰山柏。樹迴霧縈集，山寒野風急。歲物盡淪傷，孤貞為誰立。賴樹自能貞，不計跡幽澀。

此詩明顯與劉楨〈贈從弟詩〉其二所詠之內容相似，詩云：

亭亭山上松，瑟瑟谷中風。風聲一何盛，松枝一何勁。冰霜正慘淒，終歲常端正。豈不罹凝寒，松柏有本性。

劉楨詠松，鮑照則詠柏。「蒼蒼陰山柏」用的是劉楨「亭亭山上松」一句；「壹壹寒野霧」則擬「瑟瑟谷中風」之句；劉楨所詠之松面對的是冰霜與勁風的摧折；而鮑照的柏樹，遭受的是野霧寒風的侵襲，這是在意念上相同之處，面對生存環境的艱難，劉楨用「一何勁」、「常端正」、「有本性」三組詞語來形容高松，給人肯定勁健之感；而鮑照則用「為誰立」「自能貞」來描樹山

⁶⁴（清）陸欽立：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·宋詩卷九》，頁1299。

柏，尤其「孤貞爲誰立」一句，用疑問的語氣立論，在氣勢上就不如劉楨直勁，因此本詩雖欲擬其「氣勢」，但將二詩相較，鮑詩在氣力上，仍不如劉楨勁健。再看第三首詩：

胡風吹朔雪，千里度龍山。集君瑤臺上，飛舞兩楹前。茲晨自爲美，當避艷陽天。艷陽桃李節，皎潔不成妍。

這是一篇詠雪之作，寫雪的姿態、歸處、本性，此作法同於劉楨〈贈從弟詩三首〉其三：

鳳凰集南嶽，徘徊孤竹根。於心有不厭，奮翅凌紫氛。豈不常勤苦，羞與黃雀群。何時當來儀，將須聖明君。

鮑詩在句式上並未有相襲之處，而是皆取喻於所詠之物的獨特性。劉詩起首二句「鳳凰集南嶽，徘徊孤竹根」寫鳳凰孤高自潔的個性，而鮑詩「胡風吹朔雪，千里度龍山」亦顯現出朔雪遺世獨立的特色。而劉詩用「奮翅凌紫氛」寫出鳳凰凌霄的志向，是期待聖明之君的出現，筆勢是勁健剛直的。而鮑詩以「飛舞兩楹前」來形容朔雪的翩翩姿態，「飛舞」二字顯然不如「奮翅」一詞來的勁直有力，未能承接首二句「胡風吹朔雪，千里度龍山」的蒼茫氣勢，雖「自爲美」，但在「艷陽年」時則會消失不見，故「當避」二字與「羞與」黃雀群一詞相較，在意象上就顯得氣力不足。此詩雖以劉楨比興手法詠雪，卻非就雪冷冽酷寒的個性加以描繪，故雖掌握同樣的比興手法，但與劉詩詠鳳凰之作相較，顯得姿態柔美而筆力不健，不似劉楨矯健有氣。對此，王夫之《古詩評選》云：「光響殊不似劉」⁶⁵，而方東樹亦云：「特雕潤過公幹矣」，可知鮑詩不如劉楨有氣。而第四首詩云：

荷生淥泉中，碧葉齊如規。迴風蕩流霧，珠水逐條垂。彪炳此金塘，藻耀君玉池。不愁世賞絕，但畏盛明移。

這篇是以詠荷爲全詩主旨。劉楨在〈公讌詩〉中，也有對荷花的描述：「芙

⁶⁵（明）王夫之撰，張國星點校：《古詩評選》（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11月），頁264。

蓉散其華，菡萏溢金塘」，但劉楨只寫出荷花盛開之貌，而鮑詩則就荷花形貌作細膩描繪。因此本詩並非就特定的詩作予以仿擬，而是用劉楨詠物的手法來描述荷花。首二句用「齊如規」形容荷葉的外貌，而後寫流霧在荷葉上形成的水珠，「逐條垂」一詞，刻畫細微，正符合鍾嶸《詩品》論其：「善製形狀寫物之詞」⁶⁶一語。這種雕潤的手法，實非劉楨詩作最主要的特色，劉楨的詠物詩雖有對物之外形加以描繪者，如〈鬥雞〉：「利爪探玉除。瞋目含火光。長翹驚風起。勁翮正敷張。輕舉奮勾喙。電擊復還翔」但我們仍能從他的描繪中感受到一股勁健向上的氣勢，反觀鮑詩，「彪炳此金塘，藻耀君玉池」雖呈現出荷花旺盛的生命力，但其後的「不愁世賞絕，但畏盛明移」二句則並未承接前述氣勢加以發揮，尤其「但畏」二字，使全詩語勢一轉，情調下沉，筆力不健。故雖就劉楨詠物之手法擬詩，但仍不若劉詩勁健。其第五首：

白日正中時，天下共明光。北園有細草，當書正含霜。乖榮頓如此，何用獨芬芳。抽琴為爾歌，絃斷不成章。

本詩描寫不得重用的惆悵之情，情調同於劉楨〈贈徐幹詩〉二首之一，詩云：

仰視白日光，皦皦高且懸。兼燭八紘內，物類無頗偏。我獨抱深感，不得與比焉。

起首二句「白日正中時，天下共明光」意同劉楨詩「仰視白日光，皦皦高且懸。兼燭八紘內，物類無頗偏」句，寫君王之德被天下，萬物皆受其恩澤。而「北園有細草，當書正含霜」意同於「我獨抱深感，不得與比焉」，寫自身獨不受重用之惆悵。以此句接於「白日」二句之後，呈現出鮮明的對比。相較於劉楨之詩，鮑詩前四句很能表現出劉楨作詩時沉鬱悲苦的心情。鮑詩的後四句轉而替細草可憐，故用「抽琴為爾歌，絃斷不成章」此種近乎抽噎的語調來表達其深沉的無奈，這與劉詩向來的語調不同，但就情感面而言，確實掌握了劉詩「意境淒清」的特色。

鮑照由不同的層面對劉詩進行模擬，如第一首則擬其情；第二首是擬其內

⁶⁶ 同註 5，頁 184。

容；第三首是擬其作法；第四首是擬其詠物寫景之作法；第五首與第一首同，亦是擬其情，並掌握劉詩「意境淒清」的情調特色，但五首詩在氣勢上都不似劉楨原詩來的勁健有氣，不過卻展現出劉楨詩以「氣勝」為主之外的其他特色，如善用比興、情調深沉、喜用疊字等特點，較為全面的顯示出劉楨作品的風貌。

五、江淹：〈劉文學楨感懷〉

江淹是齊梁之際的作家，鍾嶸《詩品》曾謂：「文通詩體總雜，善於摹擬」⁶⁷，指出江淹以「摹擬」為其長才。他的代表作為〈雜體詩〉三十首，從漢至宋，分別就古詩、李陵……鮑照等三十人的詩風模擬之，其作詩之由，在〈雜體詩〉自序做了說明：

然五言之興，諒非夙古。但關西鄴下，既已罕同。河外江南，頗為異法。故玄黃經緯之辨，金碧浮沉之殊，僕以為亦各具美兼善而已。今作三十首詩，效其文體。雖不足品藻淵流，庶亦無乖商榷云爾。⁶⁸

由其序可知，江淹是希望透過模仿各家的詩作，來顯出每位詩人的風格特色，其模擬劉楨之詩，名為〈劉文學楨感懷〉：

蒼蒼山中桂，團團霜露色。霜露一何緊，桂枝生自直。橘柚在南國，因君為羽翼。謬蒙聖主私，托身文墨職。丹彩既已過，敢不自雕飾。華月照芳池，列坐金殿側。微臣固受賜，鴻恩良未測。⁶⁹

這首詩不僅融合了劉楨的〈贈從弟〉其二之作法，將所詠對象由松柏改為桂枝及橘柚。又摻入《楚辭》、〈古詩〉及劉楨〈雜詩〉之句，故雖言擬古，但意象實較劉楨豐富。詩的前四句皆以劉楨〈贈從弟〉其二為仿擬對象，首句「蒼蒼山中桂」仿效「亭亭山上松」，寫桂樹生長之貌；「團團霜露色」則效法「瑟瑟谷中風」，寫其生長環境；「霜露一何緊」仿效「風聲一何勁」，寫

⁶⁷ 同註 5，頁 199。

⁶⁸ 同註 1。

⁶⁹ 同註 1，頁 1571-1572。

環境之惡劣；「桂枝生自直」仿效「終歲常端正」及「松柏有本性」，寫桂枝之姿態，與原詩同具勁健之氣勢。

從第五句之後，江淹則融合《楚辭》、〈古詩〉及劉楨〈雜詩〉之句，使作品意象更加豐富。「橘柚在南國」取自《楚辭·橘頌》：「后皇嘉樹，橘徠服兮。受命不遷，生南國兮」⁷⁰，而「因君為羽翼」則取自古詩：「人儻欲我知，因君為羽翼」⁷¹之句，將橘柚比作劉楨化身，寫得遇曹氏父子之後的際遇。「謬蒙聖主私，托身文墨職」則在描述劉楨〈雜詩〉：「職事相填委，文墨紛消散，馳翰未暇食，日昃不知晏」之內容；而「丹彩既已過，敢不自雕飾」則吸收古詩：「橘柚垂華實，乃在深山側，聞君好我甘，竊獨自雕飾」⁷²，寫出幸蒙曹氏父子知遇之恩的感激。

末四句則描述自己作為鄴下侍臣的生活情形，並再度抒發感恩之情。江淹此作，雖與謝靈運同樣以劉楨的口吻來敘其遭遇，但在前四句卻仿效劉楨〈贈從弟詩三首〉其二，並使用比興手法及疊字修辭，頗能展現出劉詩勁健之氣，第五句藉詠桂與橘來抒發己身得遇曹氏父子的感激之情。江淹模擬了劉楨〈贈從弟詩三首〉其二的表現手法，呈現出劉楨善用比興的寫作特色。明人胡應麟於《詩藪》曾云：「文通擬漢，三詩俱遠。獨魏文、陳思、劉楨、王粲四作，置之魏風莫辨，真傑思也。」⁷³是很高的評價。

透過左思、謝靈運、劉孝綽、鮑照、江淹五人之作品，可以明瞭劉楨作品的特色在於能呈現「梗慨多氣」的建安風骨。左思承襲劉楨文風，並非刻意仿作，這是因二人生平際遇類似，都歷經了前中後期三種心境上的轉變，故能表達出相同的情感。而謝靈運雖言擬作，實則仿擬其口吻述其生平，並未展現「氣勝」的特色；劉孝綽亦然；鮑照有〈擬公幹詩五首〉，就劉詩的氣勢、寫作特色、表現手法等各層面加以仿擬，較為全面的呈現劉詩的風貌，可惜在氣勢上仍不如劉楨勁健有力；江淹之作，融合劉楨數首詩作內容，並運用比興手法使全詩意象豐富，展現劉楨寫作手法的巧妙。

⁷⁰ (宋)洪興祖撰：《楚辭補注》(臺北：頂淵文化事業，2005年10月)，頁153。

⁷¹ (清)陸欽立：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·漢詩卷12》，頁335。

⁷² 同註71。

⁷³ 同註43，頁138。